



迪恩·卡兰

殊途同归

慈善和私人投资在全球应对贫困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用于全球减贫的资金一度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不过，这一情况正在发生转变。目前，来自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基金会，以及来自格莱明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等社会企业的慈善捐助，加之流向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的投资基金，在应对贫困方面的工作中正受到更高的关注。

目前，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不过，它们仍需要来自私人捐赠者的援助和资金，以便帮助它们矫正市场失灵状况，推动为贫困人口寻求解决方案（见专栏）。

捐赠的发展趋势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不断增长。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对外援助（也称之为官方发展援助）、私人投资和慈善捐款的总体绝对水平出现了增长（见图 1）。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双边和多边对外援助总额占全球 GDP 的比重却出现了下降。

与全球援助的发展趋势一致的是，过去 50 年间，来自美国的对外援助额占其 GDP 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就名义金额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捐助国（但其援助额占 GDP 的比重并非最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980—2000 年期间其援助额降低所致，但 2000—2010 年期间援助额占 GDP 的比重实际上出现了增长。

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额占其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约为 0.2%；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这一比重接近 1%（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的数据）。从绝对金额来看，2011 年美国的对外

援助额为 310 亿美元，而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的总人口仅为美国总人口的 2/3）的累计对外援助额达到 580 亿美元。按人均金额计算，2011 年美国人均对外官方援助金额为 99 美元，而上述欧洲三国的人均援助金额则达到 280 美元。

部分援助是直接预算支持，另外一些援助则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如技术援助（如日本提供的援助）或者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如中国提供的援助）等。所有这些援助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发展中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往往服务于捐助国本身的利益。

民意的转变

美国人对对外援助的看法似乎自相矛盾。根据 2010 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美国人大大高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援助额，他们认为每年美国对外

援助“图谱”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用于扶贫的资金既有赠款也有私营部门的投资。

赠款是指 100% 发放给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为提供某项服务或转移支付的津贴。位于援助“图谱”的中部是那些旨在产生社会回报，而不仅仅是私人回报的投资——以向政府提供的贷款，或者向私营企业提供的股权或贷款的形式进行投资。这些社会效益可以通过积极的外部效应，如降低碳足迹或者减少传染病的传播程度来得以实现。

援助“图谱”的另一端是那些只产生私人回报的私人投资，受益对象为投资者、企业和企业客户。位于援助“图谱”以外的是那些导致负面外部效应，社会回报低于私人回报的投资。

援助额占联邦总支出的平均比例达到25%。而实际数据不足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美国人希望将对外援助预算额占联邦总支出的比例“降低”至10%，而这一比例实际上是美国真正对外援助比例的10倍（WorldPublicOpinion.org，2010年）。

不过，人们对对外援助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40年间，希望减少对外援助额的人口比重持续降低，从1974年的79%降至2010年的60%，而那些认为对外援助水平适宜或者过低的人口比重则相应增长（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不过，尽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对外援助水平偏高，但总体更可能认为该比例仍然相对较高。与此同时，他们更希望将其善款捐往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的国际捐助额占美国GDP的比重开始稳步上涨（见图2）。

美国人认为，非政府援助与政府援助相比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发展（KFF，2012年）；美国私人慈善活动的增长，可能主要源于这一认识。这一看法的准确性仍有待商榷，不过，与预算支持等可靠但很古板的传统援助方式相比，由非政府组织引领的全新援助方法（如小额信贷等）显然正吸引了媒体更多的关注。

事实上，小额信贷是上述现象的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作为接受私人善款和私人投资的一种形式，小额信贷经过大张旗鼓的宣扬（包括2006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格莱明银行和穆罕默德·尤纳斯）已经声名鹊起。像基瓦组织（Kiva）一样，Web 2.0服务通过推动与援助接受者的个人联系，将小额信贷这种已经很受大众欢迎的方式推向更多的人群。Kiva使捐助者可以了解个人客户的故事，并跟踪其还款情况，同时，它将捐助者的故事及其捐赠记录放在网站上，为捐助者赢得社会认可。对于“脸谱”（Facebook）一代而言，这种方式与“资助儿童”计划类似。另外一些新的捐助方法，如直接给予组织（GiveDirectly），进一步发展了与被捐助者直接联系的理念，使个人捐赠在没有中介机构的情况下直接到达受益人手中。

对可持续性的思考

当今慈善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涉及“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这一很有诱惑力但又界定不明确的术语。在市场或政府无法或者不愿为弱势群体提供捐助的情况下，慈善捐助往往在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非营利组织对捐助的依赖性，使其很容易受到资金状况波动的影响，从而可能危及它们实现其目标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们在资金上不具有可持续性。鉴于非营利途径所存在的不足，部分潜在的慈善捐助者已从“慈善图谱”中基于捐赠的末端转向中端——

社会回报高于私营回报的投资，甚至“慈善图谱”之外的只有个人效益、没有社会效益的投资。

营利性企业与非营利机构相比的主要优势是，营利性企业的收入直接与其产品和服务相关，如果它们提供的产品滞销在其公司财务上将会得到反映，当其产品销路良好时可确保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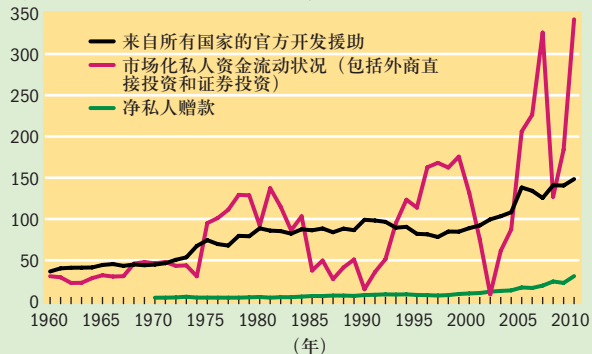
对于那些关注财务可持续发展的捐助者来说，投资发展中国家将为其提供良好的契机，可以更好地将其收入与受益人的产出保持一致，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出在财务上更具可持续性的组织机构，这是因为来自受益人的需求可以使那些成功的计划始终正常运转。很多主要的开发行业从基于捐助的模式转向以市场费率向低收入客户提供服务的模式，小额信贷就是首批此类行业之一。

实际上，要计算出如何将放债人的市场利率降至接近商业银行向富裕人士提供的贷款利率，则需要一些创造力。人们批评营利性小额信贷银行对营收的重

图1
不断攀升

过去50年间，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投资和赠款总额持续增长。

（10亿美元，以2010年定值美元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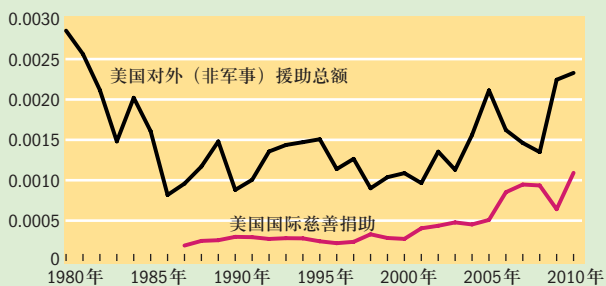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图2

另一种方式的捐赠

1980年以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比重不断减少，但私人慈善捐助比重持续稳步增长。

（占美国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援助）；美国施惠基金会（慈善捐助）。

视程度超过对减贫的重视程度，不过银行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实际上基本相同。同时，迄今为止所开展的为数不多的随机试点项目表明，与非营利模式相比，小额信贷银行在减贫方面的影响力更大。目前严格开展的试点项目还很少，但举证责任方正在发生转变，非营利模式的支持者必须提供证据表明非营利模式如何比盈利模式更为有效。

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投资水平。由于捐助者对传统援助在使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持久改变方面的能力不再抱有幻想，他们或许将注意力转向财务可持续性。尽管捐助者幻想破灭所带来的影响难以评估，与其他因素相比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较小，但仍可能确实存在。其他对投资流向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技术创新、贸易壁垒、国际税收政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接受投资国的政策环境等。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投资抱有热望，但一个基本的难题始终存在：很多投资方式实际需要也应该获得补贴，才能弥补市场失灵的状况。同时，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在社会的积极发展（贫困人口福利的改善有助于整个社会更好地运转）和道德规范（道德标准要求为那些相对不幸的人群提供某种程度的利他性和慈善行为）方面具有很好的政策意义。我们不可能依靠投资者解决全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

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从援助和慈善转向投资的结构转变，并且掌握针对具体问题的适宜解决工具，要求我们首先认真分析市场及其发挥作用或失效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当市场失灵状况确实存在时，创新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可能需要借助技术（如手机）、质量更好的蚊帐（以防止携带病原体的蚊子）或药品等。有时，可能涉及商业流程，如小额信贷等。当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以使某个问题得到解决时，市场力量就将吸引投资进入。

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可以越来越多地得到解决，这一看法使得很多人将注意力转向投资。例如，小额信贷最初只是一个非营利的理念，经过快速的发展后，现已成为一个由那些寻求牟利机会的营利性投资者所主导的方式。这与支持基本增长理论相似，基本增长理论认为，由于低收入国家的预期边际资本收益率更高，可能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因此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应该超过高收入国家。

投资额不断攀升

过去 50 年间，发展中国的投资额变化不定，但总体呈上涨趋势。

在二战后的全球繁荣时期，发展中国的投资额

大幅攀升，20 世纪 80 年代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动荡期间，其投资额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跌，从 20 世纪 90 年代迄今为止则不断回升（除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遇袭之后，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短暂的下跌外）。

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两个转变，即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提供更好的信息（直接来自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其投资额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效的市場要求提供完美的信息和零交易成本。整个市场不可能按照这种方式运行，但这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也可以作为找出问题所在的一种方式。

首先，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信息”具有特定的含义。除了提供单纯的数据外，信息还意味着完成交易、相信合同能够得到履行、确保各方对交易中的风险和效益拥有对称信息的能力。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及更近的戴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机制的改善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

当市场失灵状况确实存在时，创新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信息的改善可以建立和改进实际市场的状况。例如，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有关印度喀拉拉邦的信息与市场相互关系的重大研究发现，手机发射塔的引入，使当地渔民在选择停泊的港口前，可以给岸上的渔民打电话或者给他们发送短信，询问水产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信息的获取，导致不同渔村之间的价差大幅减小，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促进了交易量的增长和并减少了鱼产品在交易方面的浪费（Jensen, 2007 年）。

过去 50 年间，交易成本显著下降。“冷战”后，由于国有经济管理方式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非常明显，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采纳了市场经济政策，将其注意力转向消除针对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并努力降低交易成本。

发展中经济体发现，为促进国内投资，它们日益需要在公开市场为国际资金相互竞争，激发了新一轮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针对已过时税收法规的改革。道路状况的改善、资本市场限制的减少、贸易壁垒的降低、通信速度更快和性能更加可靠以及互联网的出现，都有助于降低经商的日常成本，从而使得开办企业的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环境指数”数据显示，自 2005 年开始收集该数据以来，低收入国家为开办企业或登记财产所需要的天数持续减少。随着机制的改善，投资也随之流入。

产生社会影响力

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存在何种影响？某种特定类型的投资在“慈善图谱”中处于哪个位置？投资是否确实非常重要？

“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是很多人所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产生重大社会效益的投资。在这些国家中，获得“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居民比那些获得单纯性投资的居民生活更为富足。不过，所有的投资只要没有负面后果——“负面外部效应”（并且假定不存在那些导致人们不愿拥有的上瘾——如吸毒成瘾或者酗酒的非理性行为），就应该让人们的生活状况较此前得到改善。社会影响力投资表明存在因果关系，但投资者或企业很少开展过缜密的研究，来令人信服地证实某个计划或投资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通过其他方式所不可能实现的转变。

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利的。具有负面外部效应（如污染）的投资可能导致人们事实上比以往的处境更加糟糕。在某些情形下，一项投资可能仅仅是使财富从一个地方转向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某家公司提供的是社区现在已经可以购买到的产品，而只是这家公司的广告更有诱惑力，投资这家公司将无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命运，相反只是使利润从另一家公司转向这家公司。不过总体而言，任何一个有助于增强竞争和效率，不至于造成负面外部效应的投资都可能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如果社会影响力投资要成为不仅仅停留在营销口号上的事情，就必须超越普通的有利可图的市场交易行为。

但问题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收益是否能惠及第三方？换句话说，其社会回报是否超过私人回报？例如，一家公司可能开发出清洁烹调用炉技术，这种烹调用炉所使用的薪柴比传统的火炉相对更少。使用这种新型烹调用炉的消费者可以节省采集薪柴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享受到质量更好的室内空气，整个社区也能从二氧化碳减排中受益。不过，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实际证据并不支持烹调用炉的这一理想局面。

同样，生产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不仅仅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疟疾的困扰，还有助于降低该疾病在临近街区的流行程度。与传统的投资者相比，那些选择在经济效益和积极外部效应两方面均具有潜力的项目的投资者将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当然，投资将会产生积极外部效应的看法并不免除企业在商业伦理方面的责任，也并不排斥评估其实际效益的切实需求，正如慈善机构也必须分析其计划的实际效果一样。

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可以将利润作为其投资生产的蚊帐或烹调用炉在市场上畅销的表征，不过销售状况和参与率本身并不能证明该项投资是否使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毕竟，发展中国家销售的部分最有利可图的产品是烟酒类产品（或者当地替代产品，如阿拉伯茶 khat），这些产品几乎没有有什么广泛的社会效益。

小额信贷是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过去数十年间，小额信贷的从业者大肆宣称小额信贷在减贫方面的作用，但他们是基于假设而非实证得出结论的，并且仅仅依靠计算参加者的数量来量化其所谓的成功。不过媒体中报道的故事则对接受小额信贷者的过度负债状况提出警告，人们开始担心小额信贷实际上正在损害参与者的利益。令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些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同样缺乏具体分析和数据。最近开展的六个随机对比测试结果表明，尽管获得小额信贷具有部分积极影响，但它并未真正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慈善投资者的初衷是希望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认为投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不过，开展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需要很高的费用，如果这种分析无助于提高盈利性投资者的利润，要期待他们为之买单确实不大现实。那么，谁应该为之买单呢？应该是那些希望评估投资项目的社会回报是否超过私人回报的慈善家。这些慈善家本身也可以是投资者。并非所有的投资（或者此方面的援助项目）都应该得到严格的评估——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并不合情合理的事情。不过，我们确实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多的证据来进行论证。

资金将继续通过对外援助、私人慈善和投资活动进行流动。每种方式均具有自身独特的目标、优势和劣势。不过，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着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利用时间和精力将那些真正好的东西与那些仅仅表面动听的东西区分开来，是既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未来，也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

迪恩·卡兰（Dean Karlan）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组织主席兼创始人。

参考文献：

-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0 (May). www3.norc.ox.ac.uk/GSS+Website
- Jensen, Robert, 2007, "Th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2, No. 3, pp. 879-924.
-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KFF), 2012, "2012 Survey of Americans on the U.S. Role in Global Health." www.kff.org/kaiserpolls/8304.cfm.
-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10, "American Public Vastly Overestimates Amount of U.S. Foreign Aid." 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brunitedstatescanadara/670.php?lb=btada&pnt=670&nid=6